

张闻天与中央党校

□ 谢武军



张闻天是我党历史上一位重要领导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从1933年1月走进中央苏区到1942年初离开延安，张闻天与中央党校有8年多的密切关系，对中央党校乃至党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第二任校长

1933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局决定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任弼时调任中央局代表兼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张闻天接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并任职至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结束之后。

张闻天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活动主要是三个方面：发表学术讲演、讲课和编写教材。

1933年4月9日上午9时，张闻天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发表第一次讲演，题目是《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在演讲结束时，由张闻天提议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4月14日《红色中华》第六十九期曾报道该会成立的经过、宗旨、入会手续，宣布该会除研究理论与实际问题外，并经常举行学术讲演。这年11月，张闻天担任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文化研究组和中国革命问题组的指导员。12月3日，张闻天在党校俱乐部发表了第二次讲演。

1933年，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各门课程主要由中共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方面负责人讲授。张闻天任校长之后，亲自为学校四月班（即学制4个月的普通班）制定教学计划，并出面邀请一些有实际经验的领导人讲课，比如请刘少奇讲授了“工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他自己则给学员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1934年1月，张闻天的讲稿《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由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出版，苏区中央局发行部发行，中革军委印刷所印制。全书8万字，分两讲，第一讲“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二讲“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初版印行1万册。1934年3月，又由中共闽北分区委翻印，并对文字作了校订。当年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讲课的中央负责人很多，大多给学员发过讲稿，比如朱德的《游击战争》和李维汉的《党的建设》，但成书出版的只有张闻天一人。

领导中央党校工作

1935年2月上旬，根据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从

此时到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张闻天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事关中央党校发展的重要事项，如复校、干部任免、招生原则、校址搬迁、教学内容、师生待遇等，皆由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

1935年11月下旬，中央决定立即恢复党校，并改称中央党校。12月10日左右中央党校正式开学。12月27日，张闻天主持了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陕北的学员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初到陕北那段艰苦动荡的日子里，中央党校按党中央指示先后由瓦窑堡转移至保安，又转移至定边。1936年12月29日，张闻天在致周恩来、博古的电报中写道：党校必须扩大，招收白区同志来训练后再派出去工作；党校与中央皆开往延安城。1937年1月27日，张闻天给驻定边的二十九军发电报，催促党校若尚未移动，望转告即移延安。28日校长董必武即带了几个行动身往延安打前站。29日教务主任成仿吾带领全校师生300余人离开定边，于2月10日农历除夕之夜到达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新校址。

中央党校迁驻桥儿沟的第7天，2月17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党校工作。董必武校长报告党校目前状况。张闻天总结发言，对中央党校的培养目标、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生活待遇，以及现有学员的安排都作了具体的指示，使其适应和推动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战略转变。他指出：党校任务应完全改变，最低要造就县委书记

记，培养干部的重点要放在培养白区干部上面。因此，课程、教材要完全改造，过去的都不适用，应重新讨论一次。党校的待遇要改善，教员、学生津贴可比红大稍低些。房屋等照需要开预算。党校应靠近中央。董必武当即表示照张闻天意见执行。3月初，中央党校新学期开学，学员构成更丰富了，编班方式也有所改变。

1938年1月，张闻天曾两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党校工作。1月4日的会议讨论了教员、教材、课程和各部门课程研究室指导人。按照会议决定，中央党校成立了各学科研究室，课程设置进一步规范。

在1月30日的会议上，李维汉校长报告了党校的工作状况。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党校工作的成绩和现状，强调党校的干部要加强，教员班更要加强，要造成一座大熔炉来熔炼这些新干部。今后必须使党校干部安心地学习与教书，要保证好的教员不经常调动，教员的质量要重新审查。党校的会议要减少些，要注意学员的健康，党校的生活可以改善些，伙食改为七分，津贴也增加一些。中央各方面的负责人尽可能地请到党校作报告，各种书籍党校须多发一些。

从这些简单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张闻天对中央党校的关心非常具体，对教员和学员非常爱护，把党校比喻为“大熔炉”也是他的创造。

促进党校教育事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实际已离开了党内负总责的岗位，主要履行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责。为执行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

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设立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兼任部长，管理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工作、招生工作等，领导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运动。1940年6月，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部，后来又再改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仍为张闻天。这期间，不少对干部教育和党校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决定都是在张闻天主持下或者由他亲自起草的。

1940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文件规定了干部学习的初级课程、中级课程、高级课程，以及时事政治课程和军事课程，并将这些课程作为初级、中级、高级党校课程的一般标准；决定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和“轮流征调干部”入党校学习的制度。这个文件的发布和实施，对提高党内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党校在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工作中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1940年2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布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文件共16条，规定了党校的教学方针、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党性考察的方法以及发挥民主作风的原则，是中共中央第一个专门阐述党校教育工作的文件。张闻天曾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此时正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这个文件是他多年办学经验的总结。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对中央党校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决定。这些决定的出台凝聚着张闻天的心血。他亲自起草了这些重要文件，并至少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按照文件中关于“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教育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的决定，中央党校进行了改组，大批高级干部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在随后进行的整风运动中，切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在学校内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动自治、团结互助的学风，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为党和人民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2021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省南阳市考察调研。当天下午，他视察了医圣祠，了解东汉名医张仲景生平及其对中医药发展作出的贡献。地处豫鄂陕三省交接地带的河南南阳，自古人杰地灵、贤达辈出。百里奚、范蠡、召信臣、杜诗、张衡、羊续、张仲景、诸葛亮、范仲淹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当地人将“医圣”张仲景和“科圣”张衡、“智圣”诸葛亮、“商圣”范蠡并称为“南阳四圣”。在这方热土上，一代又一代古圣先贤与能臣廉吏，为政以德，忧乐天下，尽忠职守，善治有方，孕育出了南阳独特的传统政德文化。

“坐堂医生”张仲景

南阳市东郊温凉河畔的医圣祠，是东汉医学大师张仲景长眠之地。医圣祠寄托着人们对这位具有高尚医德的千古名医的怀念，也展示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炎黄子孙的勤劳智慧。

张仲景身逢兵祸不断、天灾连年的东汉末期。据《后汉书》记载，在东汉后期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暴发过多次流行大疫。南阳一带，“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今天，在南阳出土的描绘当时疫病流行的汉画像石，呈现了当时百姓在疫病中痛苦挣扎的悲惨景象。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写到，他的家族有200多人，不到10年时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因伤寒而死的有130多人。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游历各地，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经过数十年努力写成不朽之作《伤寒杂病论》。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中国又一部光辉医学典籍。

后人怀念张仲景，不仅因为他拥有精湛的医术，更在于他心怀黎民苍

“南阳四圣”与传统政德文化

□ 顾亚奇

生的操守与德行。张仲景不仅是医生，也是一名官员。在家乡时，他就因博学多才、品行端正被誉为孝廉，后来张仲景被任命为长沙太守。在任期间，他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在大堂之上为前来看病的百姓诊治。人们为了纪念张仲景，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

明代大儒王艮曾说“百姓日用即道”，认为从政者应把满足百姓穿衣吃饭作为第一要务。对张仲景来说，终其一生，当好官是为了百姓，当好医生也是为了百姓。千百年来，张仲景一直受到文人士大夫和老百姓的景仰与缅怀，他的医学贡献护佑华夏子孙的健康，造福全人类，他为官清廉之行也被广为传颂。

“秉德淑清”张平子

在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小石桥村的田野之中，有一处清代修建的高台，台上立有石碑，碑刻写着“汉张平子读书台故址”。东汉伟大的天文学家张衡，字平子，这里正是他青少年时期的读书之地。被称作“科圣”的张衡，因顺风地动仪、浑天仪等多项划时代的发明世人熟知。实际上，张衡也是一名以清廉著称的汉代官员。公元136年，张衡被外调任河间王刘政的国相。刘政骄奢淫逸，不遵法纪，不少

豪强也乘机纠集作乱。据《后汉书》记载，张衡到任后严整法纪，打击豪强，收捕奸党，上下肃然。

东汉时期，宦官集团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势力，而张衡不惧权势，上书朝廷力陈弊端，抨击宦官干政，并把矛头对准当时朝野上下流行的“谶纬之学”。谶是方士儒生们造作的图录隐语，纬是指相对于经学而言，穿凿附会地解释儒家经书。张衡直接上疏皇帝，揭露和批判谶纬的荒谬无稽，斥之为“欺世罔俗”，并且提出了禁绝的主张，“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

博学多才的张衡为人从容淡泊、不慕功名富贵，多年得不到升迁。针对当时朝廷官员奢侈淫逸成风，张衡参照班固的《两都赋》，花费10年时间作成《二京赋》，讽谏朝政。后世崔瑗赞誉张衡“资质懿丰，德茂材美”，夏侯湛赞其为“奕奕张生，秉德淑清”。

张衡由于长年勤勉劳累，担任尚书不久就在任上去世。张衡为官半生，留下这样一句话：“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这句体现张衡为官做事的箴言，一直流传至今，丰富了传统政德文化的内涵。

“鞠躬尽瘁”武乡侯

“南阳诸葛亮，西蜀子云亭。孔子

云：何陋之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些中国人熟知的古诗文让南阳这座中原古城声名远播，虽然国内许多地方都建有纪念诸葛亮的祠堂，但位于南阳卧龙岗的武侯祠却有着特殊的影响力，“三顾茅庐”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诸葛亮因神机妙算的传奇故事被视作智慧的化身。事实上，诸葛亮在历史长河中超凡入圣的文化现象，更源于他对汉室的“忠诚”。诸葛亮生逢乱世，为了匡复汉室，一生呕心沥血。无论是筹划三分，还是平定南中、北伐中原，都寄托着他统一国家、再造山河、匡世济民的理想与信念。

刘备平益州后，曾赐给诸葛亮金500斤、银1000斤、钱5000万、锦1000匹，此后陆续的赏赐更是不计其数，但诸葛亮没有将这些财物占为己有，而是或封存于府库公用，或分赏给有功的部属和地方百姓。临终前，诸葛亮叮嘱部下将自己埋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葬时只需要挖一个洞能把棺木放进去就可以，入殓时穿平时的衣服，不需要其他器物来陪葬。在弥留之际，他给8岁的儿子诸葛瞻留下一封《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去世后，家中在成都府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

汤显祖是我国古代著名戏曲家，汤家亦是临川（今江西临川）有名的书香门第。自其祖文德公开基文昌里（今抚州老城区外），这支汤姓族人便定居于此，诗礼传家，耕读相继，累世不辍。汤显祖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其齐家之道尤其值得后世学习。

以诗书之道传家。诗书传家是汤氏家族由来已久的传统，汤显祖祖上四代皆以博学闻名：高祖、曾祖藏书、好文；祖父汤懋昭博览群书，“望重儒林”；父亲汤尚贤亦是位知识渊博的儒士、藏书家，“为文高古，举行端方”，并“建家塾以开继绪”，十分重视家族教育。汤显祖在《广意赋》中道：“鵩遗书盖四万卷余兮，招余曾与余祖”，从曾祖手上传下的诗书竟达4万余卷。汤显祖继承家族教育传统，非常重视读书学习，时时告诫子弟应刻苦求学，他在《正觉寺示弟儒祖》《看演新举人马示儿侄》等诗作中写道，“窗间白发催愁镜，烛底苍头劝读书”，“九十五骑云似锦，就中谁是我家驹”。在他的勉励下，长子汤士遴、三子汤开远接连中举，文脉流传不息。

以清正之风传家。汤显祖为官素以廉能清正著称，无论居庙堂之上抑或处江湖之远，始终如一。早在其科举时期便严词拒绝权贵招揽，后任遂昌县令时，整顿县治，廉洁为政。他曾言“予为县官，于禄入固无所爱”，主动捐出俸禄修建县书院。他离任后百姓甚为不舍，为之立生祠以记其恩德。而他听闻此消息后犹感愧疚，在《与门人时君可》的信中感叹道：“平昌祀我，我以何祀平昌也？”他的清正德行使门人子弟深受感染。平日里，他对于弟教诲不断，辞官归隐后，他仍不忘教育后辈“陶家只合栽杨柳，玉树芝兰自不多”，希望子孙要立志做高洁芬芳的芝兰玉树，不堕汤氏家风。

以勤俭之义传家。男勤女俭，家业兴旺，是他对家人最朴素的期望。在《望儿儿》中，他讲道：“游闲不是儿家业，大好归来学种田。”在《内人入斋》中则对妻子赞赏道：“清斋素服光如月，自赏香罗茉莉花。”勤俭是这个耕读世家的兴旺之源，也是其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正如他在《智志咏示子》中说的：“有志方有智，有智方有志。情士鲜明休，昏人无出意”，只有勤劳才能催生远大的志向；也正如其在《粒粒歌》中所写的：

汤显祖的齐家之道

□ 徐伟鹏

“米粒粒，我所入，不爱惜之真可泣。书篇篇，我所笺，不爱惜之真可怜”，只有俭朴才能使人懂得珍惜。因此直到去世前，汤显祖仍以“七祈免”组诗诗喻子孙：给自己简单地办理后事，节俭花费，所省钱财可以之捐资助学。

汤显祖一生极为传奇，虽然才华横溢，但因个性率直、正道直行，仕途颇为坎坷。经历了“十五载仕宦如梦”，年近半百的他又开始潜心于戏曲创作，开启了创作的高峰。特殊的人生轨迹使得汤显祖的教育观念极富特色，不是板着脸孔的教诲，而是蕴含着生动与诙谐；不是“唯读书高”，而是要为济世才。他将其真情至理化作诗词警句，融入唱段戏文，传诸子孙，也警醒世人。



的一段历史。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显示出谋划大业的格局与视野。越王听取范蠡的建议，夫妇亲自耕种、织布，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或去世，勾践亲自慰问甚至去帮着办丧事。这一系列善举，既赢得了百姓爱戴也使社会得以安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赈济贫苦，体察民情，这是范蠡辅助越王走出逆境、反败为胜的真正原因。

功成之后，范蠡悄然离开越国，此后又以杰出的经商才能积累了巨量财富。据史书载，在出现灾荒之时，范蠡多次将全部家产布施给百姓，为流离失所的百姓排忧解难。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赞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在范蠡身上，人们看到的是“做官不为官，招财不为财”的士大夫形象。范蠡的为官、经商之道，多以扶危济困、造福苍生为目的。

正如《论语》中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身立业，必先养德”“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则乱”。读史可以明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南阳四圣”的懿德茂行，折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政德文化的内涵与精髓。几千年来，“南阳四圣”和其他名臣良吏重德崇德的传奇故事，与医圣祠、武侯祠、花洲书院、南阳府衙、内乡县衙等人文胜迹交相辉映，吸引着后来人追古思今，并不断地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